

山西新军历史资料丛书

决死第一纵队革命回忆录选编

第五辑

(征求意见稿)

决死第一纵队史料征集办公室编印

一九八九年十月

编 辑 说 明

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纵队历史资料丛书，在全体一千二百余名健在同志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五年的征集与整理互作，现在将陆续编辑出书。先编成征求意见稿，经补充修改复查定稿后，再正式出版。

历史资料丛书(征求意见稿)，包括下列各册：

部队发展史、大事记	一册
军事战斗史	二册
革命回忆录	二册
组织序列表、团以上干部名册、经历等	一册
英雄模范、烈士名录	一册
文献、历史资料	二册

为使史料真正符合历史真实，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请接到史稿书籍的同志组织有关同志认真审阅修改，并将意见迅速反映上来，以便最后审查定稿出版。

向同志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决死第一纵队史料征集办公室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目 录

1、耿耿丹心创新业	胡荣贵 侯良辅 王秀圖	1
2、决死一纵队的组织互作	侯良辅 李哲夫 杨友桐 刘光智	27
3、决死一纵队后方医院的政治互作	徐恩溥	43
4、决死一纵队游击第二团的始末	王玉廷	52
5、俘虏日本下士官亲历记	阎稚新	64
6、回忆五十七团的五次战斗	符先辉	72
7、围困沁源	宋振纲	84
8、围困沁源二、三事	彭志南	120
9、夜袭临汾火车站战斗	李戈力	127
10、米家园攻歼阎六十一军一个连	吴梁记	134
11、打“虎”记	程富明	137
12、巧歼顽匪王乱子	陈 创	141
13、破坏敌军运，巧割电话机	张吉祥	149
14、教五团在武乡县石盘村收编国民党 散兵游勇经过	谢志勤	153
15、护送中央领导同志过封锁线	路 英	157
16、南渡黄河—回忆五十九团在豫西 根据地散记四则	秦俊秀	161

17、粉碎“十二月事变”见闻·····	张亮	173
18、回忆纪雨秀指导员·····	张行寰	179
19、怀念副旅长孙定国同志·····	王志遥	188
20、热血男儿英灵不朽——记薛阴槐烈士		
·····	冯耀璞	197
21、扩军记——到三十八团去·····	张克忠	204
22、决死一纵队的通信建设·····	张凌云	211
23、千峰叠翠松傲雪，弯曲沁河机声隆		
·····	胡振明	214
24、我是一个连队卫生员——抗日战争 中的一段回忆·····	史直佑	221
25、当传染病发生的时候·····	王瑾玉	228
26、山西新军决死一纵队家属学校·····	郭显周	234
27、我在决死一纵队司令部互作的片断 回忆·····	王至诚	242
28、五十九团实行精兵简政情况的片断 回忆·····	王观潮	251
29、回忆在决死队中几件难忘的事·····	申进太	261
30、请薄一波政委讲课·····	周文杰	267

耿耿丹心创新业

胡荣贵 侯良辅 王秀圃

在抗日战争熊熊烈火中诞生、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为骨干的山西新军，是一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下，实际由中国共产党组建、领导的人民军队。为保证党对这支部队的领导，当时山西省公开互作委员会领导决死队的政治工作人员和党的其他干部，与国民党、山西军阀阎锡山等旧势力进行了艰巨复杂的斗争，从而使部队始终沿着党指引的方向健康发展，终于锻炼成为一支对党无限忠诚的人民军队。

一支特殊形式的人民军队

在日寇魔爪伸入华北，危及山西的情况下，我党与以阎锡山为代表的山西实力派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关系，接办了山西抗日救亡组织“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领导了“军政干部训练班”、“民训干部训练团”和十个“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吸收成千上万的进步知识青年参加学习，为创建山西新军创造了条件。

日军占领北平、天津后，很快就逼近山西。阎锡山

面对形势的急剧变化，深知单纯依靠山西旧军（晋绥军）维持其经营了几十年的家业，已经无望，于是不得不接受我党建议，同意由薄一波负责组建山西新军。组建新军的号召传到军政训练班和民训团，我党三百多名地下党员和民先队员率先响应，倡议组织“决死队”，请缨杀敌。两昼夜之间，报名者达一千五百余人。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以统一战线形式组建的山西新军的第一支部队——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以后编为决死一纵队第一总队），正式宣告成立。从此，中共山西公开互作委员会则以领导、发展和建设新军作为中心任务，使这支年轻的人民武装，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中，在八路军的大力协助下，得到了迅速发展。到一九三九年，新军主力部队已达五万余人，成为团结山西一切抗日力量的核心武装。

开拓性的互作任务

以阎锡山统辖的山西部队的名义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一授予番号，而实际上由共产党组建领导的决死队，从诞生之日起，就存在着两种建军思想、两条建军路线的十分复杂尖锐的斗争。这种斗争，集中表现在决死队的进步力量与反动顽固势力，争夺对部队领导权的斗争。我党为了领导这支部队沿着党指引的方向健康

发展，十分重视组织建设。为了组织一支坚强的政互干部队伍，从组建部队开始，便由共产党员和一部分进步知识青年担任了各级政治互作干部，而阎锡山则从旧军中抽调了大批军官和军士，担任了从纵队长到班排长各级军事指挥员的职务。他妄图依靠这批旧军官控制部队，把决死队建成俯首听命，由他任意驱使的互具。在这种特殊形式下，关系到部队前途命运的尖锐斗争中，如何保证党对部队的领导，沿着党指引的方向发展前进，便成了决死队政治互作的中心任务。

为维持统战关系，拉着阎锡山抗日，当时，党中央北方局指示决死队：不能喊阎锡山不能接受的口号；不能做阎锡山不允许做的事。要求做到“内方外圆”，既要坚持党的立场，又要有灵活的策略，戴着“山西的帽子”，用阎锡山的语言，做好部队的巩固互作。这是一项艰巨而又全新的任务。

以统一战线形式组建起来的决死队，它不同于共产党公开领导的八路军，党的组织只能在秘密状态下进行互作；加之当时决死队的政治互作人员，大都是从事白区地下互作的党员和刚出家门、校门的知识青年，对军队互作还是门外汉，这对部队政治互作更带来了艰巨性。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只有从头学起，在互作中创造，在开拓中前进。在党的领导下，决死队的广大政互人员以八路军为榜样，结合决死队的特殊情况，灵活运用党在

白区互作的经验，把公开互作与秘密互作、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巧妙地结合起来，团结群众，依靠群众，迎着险风恶浪，踏上了斗争征程。

为了加强决死队的建设，迅速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党组织从八路军抽调了一些优秀的红军干部，以不同身份和巧妙地化妆分批输送到山西新军。他们带来了八路军的真经，成了决死队各级政治互作人员最贴心的辅导员。他们一面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主动告诉我们如何做部队的政治互作和党内互作；一面和我们并肩携手，为争夺党对部队的领导权，与反动顽固势力展开了不懈的斗争。

革命的启蒙老师

决死队一成立，就在部队中建立了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互作制度。政治委员制度明确规定：政治委员为政府派到部队中之全权代表和为部队中的最高首长，有直接处理部队中一切事宜之权。一切军政大事没有政委签署的命令、训令，一概不得付诸实施。这样，政治委员便掌握了部队的最高决策权。实行这一制度，对保证党对部队的领导，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如此，围绕着政治委员制度的存废问题，以阎锡山为代表的旧势力与我们开展了紧张的斗争。到一九三九年，这场斗争

更日益尖锐，他们公然提出在决死队中取消政治委员。而我们深深懂得：这是关系到决死队前途命运攸关的问题。为此，我党采取了正确而又巧妙的对策，寸步不让，据理力争，使阎锡山的企图始终未能得逞。这一斗争胜利，进一步巩固了党对部队的领导。

决死队的政治互作的任务，就是在政治委员的直接领导下，在思想、组织上和实际互作中，保证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曾经有一段时间，阎锡山也十分钦佩八路军的战略战术，并通令所属部队，学习八路军，改变旧战法。我们及时抓住这一有利条件，公开提出“向八路军学习”这一号召，得到了决死队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拥护，掀起了学习八路军的热潮。

在这种形势下，由于部分同志当时尚不甚理解决死队的性质，给政治互作带来了一个尖锐问题，即如何稳定部队思想，巩固部队的问题。决死一纵队初建时，成员绝大部份是进步知识青年。这些热血青年，在“七、七事变”的前夜，面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形势，忧国忧民，彷徨苦闷。正在这时，他们看到山西牺盟会发表了《告同胞书》，呼吁“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于是纷纷涌往山西，云集太原，以后自愿报名参加了决死队。这些同志来自长江南北、大河上下的二十二个省市，还有东南亚的爱国华侨和朝鲜的革命志士。他们满怀民族的悲愤

和炽热的革命激情，到决死队来寻求真理和民族解放的出路。但由于一时还不理解统一战线的战略意义，有些同志对这支戴着“山西帽子”的部队的性质，在思想上产生了疑团。他们总感到决死队的旗帜不像八路军那样鲜明，决死队提的一些口号，也不像共产党提的那样醒目，认为是一支“红不红、白不白”的队伍。特别是对那些旧军官的弄权作威，军阀主义作风十分反感。有些同志说：“要抗日就当八路军，不能在这红不红、白不白的地方干下去”。有的公开要求当八路军，甚至个别的不辞而别。有的同志临走时还留下字条，申明：“我去参加八路军，不是逃兵。”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稳定部队，这是对思想政治互作的严峻考验。

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在党内进行了教育，使党员明确：“为坚持抗战，发展党的武装，是每个党员的任务。党派我们到决死队互作，就是要掌握这支武装。如果我们党员都走了，把部队交给谁？”通过教育，使党员深刻理解戴着这顶使人厌恶的“山西帽子”只是一种形式，而我们是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这才是问题的实质。同时，我们还教育党员明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是各阶级在“抗日”这一点上的统一，各阶级有不同的立场，斗争错综复杂。我们应以抗日大局为重，求同存异。根据我党关于“形式上可适当让步，实质上决不能妥协”的指示精神，积极开展互作，以利团结抗战。

当时，阎锡山为标榜他的进步和独立性，有一套自己的“山西语言”，如共产党号召“抗日救亡”，他则只允许说“抗敌救亡”；共产党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则改为“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等等。当然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咬文嚼字，实际上有他秘不可宣的用意。但在只有认可他这种独立性和特殊性，他才开绿灯放你通行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善于利用“山西语言”，提出一些表面看来不十分醒目、鲜明，而实际上赋予新内容的口号，以利开展我们的互作。经过这一教育，拓宽了党员的视野，提高了贯彻执行党的统战政策的自觉性。

在此基础上，对部队也开展了普遍深入的政治思想教育。经牺盟会起草、阎锡山同意的《山西民族革命十大纲领》和《牺盟会互作纲领》，都以不同的词句，基本上反映了共产党的主张。我们根据上述纲领的精神，提出了决死队的三大政治任务，即：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实现民主共和国，建设人人劳动、人人享受的“按劳分配”社会。这“三大政治任务”，集中表达了广大劳动人民和队员们的意愿。对部队进行三大任务的教育，实际上是进行我党最低纲领的教育，使部队有了明确的政治方向和奋斗目标，认清了这支戴着“山西帽子”的部队的性质。根据上述纲领，在部队建设上，贯彻了“三一致”（即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和“四新”（即进行新的教育——民族革命教育，执行新的统驭；

实行新的管理，贯彻民主集中制；学习新的战法，开展游击战)。将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改动了一些不损害实质内容的字句，教育部队严格遵行。经过上述一系列教育，不仅稳定了大家的情绪，巩固了部队，并且有力地加强了决死队人民军队的思想建设，从而从思想上巩固了党对部队的领导。

为把青年队员追求进步的热情，升华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意志，决死一纵队还采取不同的形式，对部队进行马克思主义基础教育，引导大家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著作。当时，在敌后极端困难的战争环境里，读物很少，见到一本马列主义的书，都争相传阅，民革室、救亡室(如现在部队的俱乐部)，成了大家学习的场所；上大课之后的讨论会、辩论会、问答题成了互相切磋、互帮互学的最受欢迎的形式。学习蔚然成风。决死一纵队政治部为指导部队的学习和互作，还创办了《行军日报》和理论刊物《战旗》。全体政治互作人员，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对部队进行树立革命人生观的教育，为打牢人民军队的政治基础而忘我地互作着。

在提高部队觉悟的基础上，大力加强了党的建设。当时决死队里，党的组织虽然是秘密的，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在队员们的内心却深深地扎下了根，党以它崇高的威信和巨大的凝聚力，将群众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广大队员随着觉悟的提高，许多人提出了加

入共产党的强烈要求。为使政治互作适应这一新的形势，对部队进行了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并对条件成熟的同志，个别吸收入党，进一步扩大了党组织的力量。民族革命青年团(简称民青)，她是决死队党的外围组织，在当时，党的许多互作都是以民青的名义开展的。“民青”在协助党组织进行互作中，使自身也得到了发展。党的发展，又从组织上巩固了党对决死队的领导。

这批决死队队员，绝大多数在以后的斗争中，锻炼成了无产阶级的坚强战士。仍健在、鬓发斑白的老决死队员，每当他们回忆起自己的人生旅程时，都念念不忘决死队对他的培育，因为那是他革命征程的起跑线。正如一位老同志所说的：“决死队是我革命的启蒙老师。”

与反动顽固旧军官的斗争

阎锡山派到决死队的旧军官，开始许多人思想反动，仇视共产党。阎锡山用这一批人担任部队各级的指挥官，就是为了掌握部队的领导权，使决死队成为他控制的御用工具。所以，在决死队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就直接地表现为进步力量与反动旧军官的矛盾和斗争，而且从建军之日起，这一矛盾和斗争就已尖锐地表现出来。那些反动顽固的旧军官，仇视政治互作人员，极力设置障碍，阻挠政治互作。旧军官对薄一波政委关于决死队

的建设要“政治化，民主化”的口号十分反感，总是千方百计借机诋毁。部队没粮吃了，连队派人背粮，有的旧军官就讥讽地说：“你们不是要政治化嘛，还吃什么粮，吃政治不就吃饱了吗！”有的则咬牙切齿地叫嚷：

“等着吧，总有一天和你们算总账！”满怀救国救民激情的队员们，与旧军官在思想感情上更是格格不入，从一接触就产生了对立情绪。旧军官把封建军阀统治军队的那一套办法，原封不动地搬到了决死队，实行“愚兵政策”，强调“绝对服从上级”，不准知道“为什么”，说什么“上级说得有理要服从，无理也要服从。”他们为消磨部队追求进步的锐气，以整顿军纪，严格管理，加强训练为名，大肆整治队员。有个队的旧军官借口锻炼部队的吃苦精神，竟命令部队在赤日当空的中午，坐在院中曝晒，并美其名曰“抗日”运动，以此来故意折磨队员。他们还任意打骂队员，像封建主一样自立家法，规定“站岗走火者枪毙”，“严重违纪者杀头”。他们妄图依靠这种高压手段来制服大家，驯服地跟着他们转。

决死队的广大政治工作人员团结全体队员，与这种野蛮的军阀主义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有一次为保护队员，打击反动顽固旧军官的嚣张气焰，几乎白刃相见。那是一九三七年九月间，决死一纵队的一总队，奉命开赴晋东南开辟抗日根据地。在行军途中，一中队的王承鸿、苏策、崔玉申三人因过度疲劳落伍掉队，次日清晨

才赶到连队。总队长徐绩璋利用政委薄一波赴太原议事，离开部队的机会，竟抓住这件常有的小事不放，给三人定下“夜不归营”、“擅离职守”、“冒犯军纪”等罪名，要宣判“枪决”。妄图借机杀人，压服群众，打击进步力量。政治主任牛佩琮与政治工作人员商议，如果徐绩璋顽固不化，则与其进行坚决斗争。在一大队指导员廖鲁言、一中队指导员孙筠如和二中队指导员刘有光领导下，经共同研究，及时向部队揭穿徐绩璋的阴谋。并为防备徐口是心非，耍两面三刀，临场时突然宣布“枪决”，他们对部队进行了严密布置。如果出现上述情况，即与凶手们血拼。当王承鸿、苏策、崔玉申三人被绳捆索绑带到部队面前时，同志们个个怒气冲冲，有的弹上膛、刀出鞘，等待如何宣判。徐绩璋见势不妙，被迫缩回魔爪，只得宣布“记名枪决”。这时气氛才稍微缓和下来。那三人中的共产党员王承鸿，临危不惧，挺身而出，对徐绩璋所强加的罪名逐条进行了驳斥。徐绩璋见阴谋不能得逞，只好草草收场。

阎锡山曾将《山西民族革命十大纲领》，规定为全省各界共同遵守的准则，它成了我们与顽固势力斗争的有利武器。《纲领》的第二条提出：“在军队中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据此，在部队中普遍开展了民主运动，发动群众，行使民主权利，批判军阀作风，反对弄权作威、强迫命令。强调要尊重人格，不准打骂士兵。随着

民主运动的开展，为维护指战员的权利，在基层连队都成立了士兵委员会，规定连队的重要事宜，必须经士兵委员会讨论通过，才能付诸实施，从而有力地限制了旧军官利用职权的倒行逆施行为。

在旧军中，几乎是无官不贪，吃空名、喝兵血，贪污公款，中饱私囊，这都是彼此心照不宣，司空见惯的事。有些到决死队担任主官职务的旧军官，仍是按旧军中的那一套我行我素，恶习不改，贪污公款和连队的伙食费。政治工作人员针对这一情况，号召队员们检举揭发，清算账目，在众目睽睽之下，揭露这些人的恶迹。为实行经济民主，各连队成立了生活委员会，负责经济监督，严格经济制度，杜绝贪污漏洞，维护了指战员的利益。有的旧军官生活腐化，糟蹋妇女，军民无不痛恨。我们在民主运动中，召开军人大会，对这种丑恶行为进行了揭发批判，使这些衣冠禽兽的原形，暴露在大家面前。

在这次民主运动中，有恶迹者，轻的要在军人大会上批判，重的则交由上级处理，恶迹昭著者被撤销了职务。这样一来，有个别人见在决死队无利可图，自己就悄悄地溜走了。各连队经群众酝酿，民主选举了班排长。旧军官和班长中好的被留用或提升，坏的都落选，提升队员充任。决死一纵队经过这次民主运动，不仅教育了广大队员，鼓舞了部队士气，有力地打击了顽固势力的

嚣张气焰，而且进一步从组织上加强了党对决死队的领导。

当时，我们多数政治工作人员，因从事军队工作不久，一时还缺乏军事知识。反动顽固的旧军官就利用我们这一弱点，极力炫耀自己“懂军事，会打仗”，恣意贬低政工干部，阻挠政治工作。有的甚至猖狂叫嚣：

“战场上见高低”！但会打仗不等于敢打仗。在一次战斗中，一个任队长的旧军官在战斗危急的时刻，临阵脱逃，转眼不见了，是政工干部率领部队英勇拼杀，才转危为安。战斗结束后，愤怒的队员到处搜寻，终于在一户居民家中找到了这个已换上破旧便衣，准备逃命的队长，弄得他狼狈不堪，无地自容。战场是检验真假英雄的试金石。那些平时叫着要在战场上“看政工人员出洋像”的人，都先后在战斗中亮了像，不过是“银样蜡枪头”。所以每经一次大的战斗，都有因贪生怕死，畏缩不前或临阵脱逃的旧军官被撤职，而由红军干部接任了他的职务。

在这场严峻复杂的斗争中，我们不仅取得了胜利，而且也使广大队员受到了深刻生动的教育，他们更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那些担任游击教官的红军干部和政治工作人员，成了领导部队的核心。旧军官中特别是下级军官中，有相当一部份是拥护抗日，倾向进步的。在斗争中，我们根据党的区别对待的政策，重点打击那些